

“台北是吾家”

頭次到台灣，就有“家住台北”的感覺。後來再去，那種遊子歸里的濃烈情懷依然未減。這也許是自己至愛的姨、姐長年居於當地之緣故；也可能因為在那裏得以充分使用“母語”（閩南話）和“國語”，……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：在台灣，自己對中華文明的源流分合，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。回顧自己的大半生，無論在故鄉（泉州——廈門）的二十年，還是在京華的二十四個寒暑，抑或來香江的十年光陰，每每因各地的格調有異而產生不同的感想。可是這些互別的情調，居然能夠在台北找到一種濃縮性的攙和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：台北正是中華傳統、閩南鄉情與現代文明的結晶。難怪自己在此地時時產生鄉思鄉情了。也正因為如此，筆者深願把一星半點的感觸塗寫出來，與大家共享。

*

*

*

在台北的大街小巷，在帶有閩南風味的小吃館，在北方大兵喜愛的燕京樓，在青年男女卿卿我我的咖啡屋，到處都聽到人們操著一種含著福建——台灣腔調的國語。從大多數人的長相或口音，不難斷定他們都是早年福建移民的後胄，他們都會說台灣話——以廈門音為標準的閩南話，可是他們自然而然地採用國語，作為交流的工具。

究竟是甚麼契機，造成此種值得留意的歷史現象呢？這一切大概都得追溯到1949年國民政府之播遷台灣，追溯到後來全台之統一推行國語。當然更值得重視的是，國民政府以原來管理一國的經驗、人才乃至資金，退而經營起一島一省，終於造成今日台灣經濟的飛速發展。對於這一切一切，作為一個閩南人，自然會為先輩移居地竟然取得今日傲視全球的奇跡，而深深感到榮光與驕傲。

*

*

*

由台北的閩南話，不禁推思及全國各地的方言，而且進一步浮想聯翩，覺得以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之重要性綜合而言，今日神州大地有四大城市：北京，上海，台北，香港。倘若再加細思，更有趣的是，這四大城市的居民大多數都各操一種方言：北方官話(北京)，江浙話(上海)，閩南話(台北)，廣州話(香港)。雖然北方官話目前演化為國語或流行的普通話，但其他方言在特定的城市或地區，仍有不容否定的重要性。

*

*

*

上述四大城市不僅大多數居民所操方言有異，而且它們對中華祖國未來經濟之發展，都具有顯要的地位。或者可以這樣說，未來由北至南，中國沿海一帶將形成四大經濟特區，而這四大城市則分別成為各區的中心，並與另外的都市結成姐妹城：(1) 渤海區：北京——天津；(2) 東海區：上海——杭州；(3) 台海區：台北——廈門；(4) 南海區：香港——廣州。

如果此種設想有某種合理性，則廿一世紀間神州大地將展開一場熱烈的競賽：操著不同方言的四大特區居民，同內陸各區(中南、西南、西北、東北)各自憑藉特點，揚長避短，力爭上游，望能早日廁身於中華乃至寰宇先進之行列。

*

*

*

台灣今日傲人的經濟成就，還令人想起1949年前後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轉折，以及大陸和台灣的不同發展道路。

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，當自己步上中正紀念堂的高廊，眺望眼前開闊的廣場，一種奇異的念頭立即映入腦海：中國現代史上有三大人物，孫中山安息於南京，蔣中正埋葬在台北，毛澤東停靈於北京；

他們對現代中國各自發揮了不同的作用，而身後竟毫不相擾，各得其所。這種安排正是歷史進程決定的不同命運，既非他們自己的主觀抉擇，也絕非人力所可確定或挽回。

* * *

隨著經濟的飛躍進展，使台灣政治自然而然地出現一種轉變：推行兩黨制，趨向民主化。在酒樓茶館，在街頭巷尾，人們都可自由自在地論政。筆者曾躬逢一次大型的露天集會，演說者公然抨擊執政的國民黨之弊病。但這並不違法，也無須擔心身繫囹圄。

誠然，今日台灣國會中不乏兩黨互相鬥毆的場面，但不必為此而搖頭太息，也不要認為其民主政治困難重重。其實，這種局勢比之表面輿論一律、一致通過的格局，要進了一步。這種混亂的局勢，可以視為中華民主之開端。因為自由民主制度尚未樹起權威，人們未完全適應民主協商的方式，猶如初生嬰兒不免形貌醜陋、毛手毛腳，慢慢就會日趨完美、面目全非。記得二百年前法國大革命之初，共和制剛剛建立，議會中也是各派紛爭擾攘，甚麼斐揚派、吉倫特派、雅各賓派、平原派（沼澤派）等等，後來更出現拿破侖的專制與侵略。倘若保守一些估計，中華古國至少已踏上當年法國所由出發的起點——步向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、共和、民主。

以是觀之，台灣由國民黨專政演成兩黨競爭，實是中華民主的曙光。中國的現代化、民主化進程雖然緩慢，但如假以時日，走完苦難的歷程，則前途實未可限量。

（原載《明報月刊》1992年12月號；另刊於《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》，學津書店2000年增訂版）